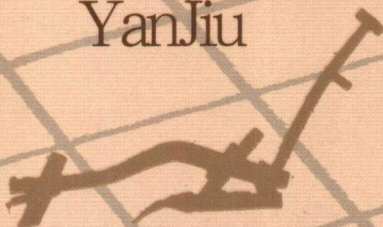


滇南少数民族 农耕文化研究

李学良 著

DianNan
ShaoShu MinZu
NongGeng WenHua
YanJiu



民族出版社
THE ETHNIC PUBLISHING HOUSE

滇南 少数民族农耕文化 研究

李学良 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滇南少数民族农耕文化研究/李学良著. - 北京: 民族出版社, 2006. 10

ISBN 7-105-07908-8

I. 滇... II. 李... III. 少数民族-农业史: 文化史-研究-云南省

IV. F329.7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126700 号

滇南少数民族农耕文化研究

著 者: 李学良

责任编辑: 龚黔兰

封面设计: 吾 要

出版发行: 民族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和平里北街 14 号 邮编: 100013

电 话: 010-64228001 (编辑室)

010-58130038

010-64224782 (发行部)

http: //www. e56. com. cn

印 刷: 迪鑫印刷厂

经 销: 各地新华书店

版 次: 2006 年 10 月第 1 版 2006 年 10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87 毫米 × 1092 毫米 1/16

字 数: 250 千字

印 张: 13.375

定 价: 26.00 元

该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退换

目 录

序 / 1

第一章 绪 论 / 3

第二章 农地利用模式 / 12

第一节 概 述 / 12

第二节 土改前的农地利用模式 / 18

第三节 农地利用模式的变迁 / 34

第三章 西双版纳社区农地变迁 / 47

第一节 曼蚌村调查 / 48

第二节 曼光村调查 / 58

第三节 曼戈龙下寨调查 / 66

第四节 东风农场五分场二队 / 75

第五节 国营东风农场三分场五队 / 77

第六节 五个调查点比较 / 81

第四章 坝美村土地利用与环境变迁 / 86

第一节 社区用地布局现状 / 86

第二节 社区用地变迁轨迹 / 100

第三节 当前家庭农地利用实例 / 113

第四节 水库及水源林问题 / 116

第五节 简要分析 / 119

第五章 对农地利用的文化分析 / 122

第一节 农耕文化类型 / 122

第二节 农地类型的经济和生态功能 / 125

第三节 农地模式的社会经济功能 / 132

第四节 梯田与红河哈尼族近代社会经济结构 / 144

第五节 农地利用模式变迁的社会经济因素 / 150

第六章 生产工具 / 157

第一节 滇南农具源流简述 / 157

第二节 农具基本类型 / 161

第三节 对农具的文化解读 / 179

第七章 农耕礼仪 / 186

第一节 佤族农耕礼仪 / 186

第二节 哈尼族农耕礼仪 / 190

第三节 傣族农耕礼仪 / 197

第四节 农耕礼仪的文化意义 / 200

后 记 / 209

序

2003年李学良同学以《文明的历史脚步——建国以来滇南少数民族农地利用模式的变迁》一文通过博士论文答辩，获得评委的一致好评，获得博士学位，并被评为当年中央民族大学的优秀博士论文。在读博士之前，李学良同学已经有长期从事民族学田野调查和民族学研究的基层经历，但理论功底较薄弱。在读博士期间，他刻苦学习，认真钻研，进步很快。毕业以后，他继续农地利用和农耕文化方面的研究，并借助他在博物馆工作的便利条件，增加了生产工具等方面的文字和大量图片，进一步修改丰富了博士论文，完成了这本《滇南少数民族农耕文化研究》，作为他的导师，我感到十分高兴。

现在这本书，在博士论文基础上做了拓展，作者抓住滇南民族多样性和文化多样性十分突出的特点，主要阐述了新中国成立到现在当地各少数民族农耕文化的多样性和变迁轨迹。世居滇南的少数民族主要有彝、哈尼、傣、拉祜、佤、苗、瑶、布朗、基诺等民族以及尚未确定族属的芒人、克木人等。本书对滇南少数民族的传统农耕特点做了概述，并重点探讨了傣族、哈尼族和佤族的农耕文化，作者认为傣族、哈尼族和佤族分别是新中国成立初期滇南少数民族三种主要农耕文化形态即坝区水稻农耕文化、山区梯田水稻农耕文化和山区旱地农耕文化的代表性民族，这是有一定道理的。在陈述这些民族的农耕文化特点时，作者没有面面俱到，而是抓住了农业土地利用、农耕工具、农耕礼仪几个重要方面进行叙述和比较。

作者认为农地利用模式是人的意识主导下的生计布局图案，这个

模式是农耕活动的一面镜子，物产、土地制度、耕作方式、灌溉系统、生态景观等都可以从农地模式中解读出来，不同的农地利用模式体现了不同的农耕文化特色；农具的种类、组合特点和使用方式反映了人对土地的影响方式、强度，也反映了社会生产的特点，不同的农具及其组合方式体现了农耕经济和社会文化特点以及人与自然关系的差异；农耕礼仪往往集中表达了耕作者对耕作对象、耕作目的等的观点和愿望，在不同的农耕形态和农耕民族中，农耕礼仪的差别体现了他们对自然、对土地、对耕作和对农耕宗旨理解上的差异和特色，体现了各种文化对于人及其环境关系的根本理念。新中国成立以来滇南传统农耕文化在政治、经济、社会等多种因素综合影响下发生了深刻变化，劳动力、劳动方式、产品消费方式以及土地和其它自然资源的配置方式、物种之间的关系等都进行了重组，从而也改变了区域文化生态系统的传统运行模式，总体上，滇南各民族的农耕文化进入了从传统向现代转型的关键时期。

以上观点是否正确，还可以商榷。但本书有一个明显的优点：李学良同学出生在农村，干过农活，对农业和农耕文化有直接的体验，加之他做了大量的田野调查，使本书的论说有生动、坚实的材料基础，因此所得出的结论有较强的说服力。当然，对一些问题的论述还略显不够，有待进一步深入探讨。

是为序。

邵献书

2006年9月2日

第一章 绪 论

本书是区域性、历时性和专题性研究。本研究的地理区域是滇南，即云南南部；时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到现在；研究主题是在这一时空中农耕文化多样性的表现形式和变迁轨迹，并借此探讨在滇南各民族的传统农耕行为中人与自然的互动，即区域人工生态系统或农业社区环境系统的运行特征。我们特别关注系统运行中社会和自然资源的配置与利用方法。

这一章简要介绍本研究的时空对象、主要内容和研究框架。

一、时空背景

人在一定空间中生存，利用这个物理空间条件进行活动、布局生计。人并不是机械地、本能地使用和适应其生存空间，而是通过自己的智慧，能动地利用自然空间及其各种自然条件，给这个生存空间打上了自己创造力的深深烙印，改造成“人造环境”。滇南农耕文化的存在空间是居住着多种民族的云南南部。云南属于内陆省份，但距离太平洋和印度洋都不太远，季风气候明显。云南的地形地貌以山地、高原为主。在分布上，元江河谷及洱海—剑川以西以山地为主，高原则主要集中于东部。本文所指的滇南位于西部山区。云南西部的山地是横断山系的一部分，故也称为横断山地区。横断山系在云南境内北高南低，其中北段主要由高黎贡山、怒山（碧罗雪山）、云岭等多组大山组成，滇西南、滇南的山地都是这三大山脉的支系或余脉。滇南山地主要为云岭切开的分支，云岭向东约至大理、下关一带结束；巍山、弥渡以南，又转化为两支，即东部哀牢山、西部无量山。两支山地一支向东南、一支向东，间距逐渐加宽，高度逐渐降低，形成整个滇南的基本地形构架。哀牢山为一西北—东南走向的巨大山脉，受元江及其支流阿黑江、把边江、藤条江等的切割，山脉又分成几条分支，向东南逐渐进入越南境内。

无量山分布于把边江以西，澜沧江以东，它北窄南宽，山势比哀牢山低，比较缓和。在山脉南部河流分割破坏较轻的地区分布有一些盆地，如普洱、思茅、景洪等。澜沧江、元江两大水系分别穿过滇南的东西部，近河流处切割深，坡度陡。由于元江、澜沧江及其支流的切割，滇南山地的垂直地带性十分明显，在同一纬度地带，因地势高程的差异，形成了山麓、山腰及山顶“一山分四季，隔里不同天”的显著立体气候特征。滇南多民族、多形式的农耕文化就是在这种复杂地理空间中孕育和成长起来的。由于海拔高程、地形特点、人口分布、历史传统等的不同，滇南的农耕文化在不同小区域和不同民族中往往表现出不同的特点。同时，由于他们同处于一个大的地理区位系统中，加之各民族之间的相互影响，所以构成了农耕文化因素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特点，并构成了基于紧密地理区位系统和文化互动系统的大滇南山地农耕文化体系。

滇南是我国少数民族最为集中的地区之一，滇南所有县级行政区域中，几乎都是民族自治地方，民族和民族文化多样性甚为突出。本研究涉及范围包括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红河南岸，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各县市以及思茅地区的西南部和南部。这一区域大致在北回归线以南，东经 $99^{\circ} \sim 104^{\circ}$ 之间。它们是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的红河县、元阳县、绿春县和金平苗族瑶族傣族自治县；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的景洪市、勐腊县和勐海县；思茅地区的江城哈尼族彝族自治县、普洱哈尼族彝族自治县、墨江哈尼族自治县、西盟佤族自治县、澜沧拉祜族自治县及孟连傣族拉祜族佤族自治县。此外，这一区域的周边，也多为民族自治地方，如玉溪市的元江哈尼族彝族傣族自治县、思茅地区的景谷傣族彝族自治县及临沧地区的双江拉祜族佤族布朗族傣族自治县、沧源佤族自治县等。从这些州县名就可以看出滇南各少数民族的基本分布情况和集中程度。

与其他少数民族聚居的省区相比，云南少数民族的特点是在全省范围内单一少数民族的人口或文化占主流的情况不明显，民族多样性和文化多样性是这一区域的鲜明特点。云南山区是少数民族分布最广、文化多样性最突出的地方，滇南是其中的一个典型。世居滇南的少数民族主要有哈尼、傣、彝、拉祜、佤、苗、瑶、布朗、基诺等民族以及尚未确定族属的芒人、克木人等。他们中不少是跨境民族。其中哈尼、傣、拉祜、佤、布朗和基诺族在国内主

要分布在云南省。以上各民族在滇南山区的居住具有一定的垂直地带分布特点,如傣族喜居下半山河坝地区;哈尼族主要在中,上半山也有部分分布;彝族在中、上半山都有分布;拉祜、佤、苗、瑶、布朗及基诺族则主要分布在上半山。这种带状分布特点主要是由于历史上人口迁徙、社会政治经济影响及各民族居住传统等原因造成的。这种分布特点深刻地影响了各民族的经济和文化生活,从而带上了鲜明的区域和民族特色,这在他们的农耕文化中也有充分的体现。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滇南的社会历史发展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阶段,政治制度、民族关系、经济政策、文化环境等实现了历史性的转变。同时,在这半个世纪中,农业政策和相关措施、方法也有较大的起伏,从而驱动了当地各民族农耕文化的深刻变化。

从历史的角度看,无论农地利用模式、农耕工具还是农耕礼仪,都只有相对的稳定性,它们都表现为动态的过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现在五十余年,滇南社会经济的变迁可以大致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土改前的情况可以代表变迁的起始平台。这个变迁的起点是滇南各民族的社会历史比较封闭地发展的结果,土地以土司所有、村寨所有和地主所有三种所有制为主要形式。个体家庭劳动为农地利用的主要形式,农具主要为个人所有,农耕礼仪分家庭、村寨、区域等不同层次,农业祭祀非常受重视。

第二阶段:1956年左右,在滇南实行了社会制度的变革,主要内容是消灭原来的社会制度,过渡到社会主义公有制。变革方式根据各区域、各民族社会发展层次的不同,主要采取两种途径:一种是在原来的土司直辖区及其周围进行和平协商土地改革,分两步:第一步废除封建制度,第二步消灭生产资料私有制,完成向社会主义的过渡;第二种是在保持着原始公社制浓厚残余的地方不进行土地改革,而在帮助他们发展生产和互助合作的过程中对落后因素进行必要的改革,逐步地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制度,如西双版纳的基诺山、布朗山和思茅地区的阿佤山中心区,以及红河南岸的少部分边境沿线山区人口,都采取了直接过渡的形式。严格说来当时并非所有人口都进行了土改,但土改是其主要形式。向社会主义过渡完成以后,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到70年代末,这一时期实行土地的社会主义国有制和劳动群众集体所

有制，以集体化生产为农地利用的主要形式；主要生产工具如犁、耙、耕牛等为集体所有，锄头、砍刀等仍然以个体所有为主，几乎所有农耕礼仪尤其是传统农耕祭祀等活动都被取消。

第三阶段：从1980年左右包产到户的实施到20世纪90年代中叶，这一时期土地所有制不变，但土地利用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主要形式。

第四阶段：从20世纪90年代后期到现在，西部大开发工程的启动是这一阶段的主要标志。退耕还林、退牧还草、自然保护区数量和面积的迅速扩大等国家级重点工程的实施以及经济园林的大规模营造，是这一时期农地利用变化的主要因素，国家直接干预农地利用的调整是这一时期的鲜明特点。在第二阶段的后期和第三阶段，电机农具逐步得到推广，碾米机的普及最为突出，在西双版纳坝区，小型耕作机也已经基本普及。滇南各民族中，传统农耕礼仪不同程度地进行了恢复，不少地区，政府和民间组织还介入了其中，将这些传统节日习俗作为地方文化开发项目向外界推介，因此，这些传统礼仪隆重化、娱乐化的趋势比较明显。这也是滇南各地各民族传统农耕礼仪变迁的普遍趋势。

二、研究重点

农耕提供了人类社会的生存基础，也是到目前为止人类作用于土地、作用于自然最广泛、最深刻的一种方式。滇南各民族在长期的农耕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农耕文化。本书讨论农耕文化，没有面面俱到，而是抓住三个重要支点展开。

（一）农地模式

农地模式即农地利用模式是指人根据土地的自然条件，按照希望收获的农产品目标，对一定区域的土地进行分类利用而形成的不同农用地类型之间有机组合的方式或模式。农地利用模式是人对土地施加影响而形成的地表格局，它是人的社会行为的结果，与人的需求、社会组织 and 土地利用思想等相互作用、相互影响。农地利用类型不仅包括耕地的各种表现形式，还包括森林、道路、草场、灌溉体系等要素，它们是一个有机组合模式或系统。即便是人工干扰因素最少的林地，现在也多是人为了自己的目的，如作为水源林、防护林、放牧地、休歇地或采集地等而特意留存的，它与其他土地利用类型

构成一个有机整体。因此,农地利用模式是人的意识主导下的生计布局图案,其中每一种农地类型都发挥着特有的功能,并服从和服务于整体功能。不同类型的农地在一个社区、一个村寨中同时存在,共同形成农地利用的组合模式,这个模式是农耕活动的一面镜子。物产、土地制度、耕作方式、灌溉系统、生态景观等,都可以从农地模式中直观地解读出来,它是人作用于自然的结果,是人类刻画在自然脊背上的图案。

我们把农耕模式区分为山区旱地农耕、山区梯田水稻农耕和坝区水稻农耕等,主要是以农地利用模式中占主导地位的农地类型在表现形式上的差异为标准的。事实上,每一种农耕模式,都不仅包含山区旱地、山区水田或坝区水田中的一种用地类型,而是几乎每一种农地类型都兼容其他类型的农地,共同构成农地利用的有机模式。因此,农耕类型概念的区分,只是突出了农地利用模式中的那种主要用地类型。由于各种用地类型比重和平面组合等的差别,农地利用模式之间就出现了各自的特征,这些特征直接在农业生态系统和农业经济状况中明显地表现出来,从而也影响了当地人民的社会文化风格。

滇南各种农地利用模式的形成除人为因素外,与其地理和气候特点也分不开。滇南一带的地貌类型可以大致区分为山区和坝区,只是各地坝区和山区的比例不一样。如在澜沧江流域的西双版纳境内拥有数量较多、面积相对宽广的山间盆地,澜沧江水系对境内没有构成深切割,地势较为平缓;红河南岸则山脉纵横,红河水系对红河南岸的山体形成了深切割,山势陡峻,山间盆地数量少,面积狭小。但即便有这种差异,滇南的土地都是坝区和山区按一定比例共同构成的。因此,在一个区域,在不同的海拔高程,分布着不同的农地利用模式。但是,如果我们将坝区和山区视为一个整体,那么山区旱地农耕与坝区水稻农耕或山区水田农耕与坝区水稻农耕,就分别构成了这个系统的要素或亚系统。事实上从生态系统的角度说,它们之间的地理和环境相互影响是十分明显的,“山上开荒,山下遭殃”等民谚就生动反映了这种关系。不仅如此,山上和山下的人们之间经济和社会文化的互动也十分频繁。因此,对地形和海拔高差而形成的这种山上-山下立体农业生态系统做整体考察,是有理论和现实意义的。

（二）农耕工具

农业是从人类利用农具对土地、对自然生态进行有目的的加工开始的。随着农业的发展，农耕工具出现了整地农具、播种农具、中耕农具、收获农具、排灌农具、谷物加工农具等。在特定的劳作活动中，农具常常以单件的使用为基本特点，但对于整个生产周期而言，各个生产工具的作用体现为完成整个生产的各个环节的手段。因此，不同种类和功能的生产工具的组合，才可能为实现生产的最终目的提供手段保障。生产活动的多环节性、多侧面性和目的的一致性，决定了生产工具的多种类性和组合的系统性。一定社群中，各种农具的组合构成了一个有机工具系统。农具的种类和使用方式，反映了人对土地的影响方式、强度，也反映了社会生产的特点。因此，它是人的经济和社会文化特点以及人与自然关系的一个指示器。

整地农具、播种农具等的分类，是以它们所具备的功能为标准的。以功能区分农具种类，并不是农具本身带有这种特质，它是通过人的使用来实现的。事实上，每一件农具在人使用它之前，都是孤立的单独存在体。当使用它们时，每一种农具代表一个或几个特定功能，各种不同农具的组合构成农具的功能系统，它与人的农业生产各个环节即整个生产体系相伴随，成为人实现生产目的的基本手段。因此，单件农具的意义只有通过其系统才能得到有效的理解。一方面，如果没有以其他农具为手段的劳动环节的前后相连，使用单件农具的特定劳动环节将变得毫无意义；另一方面，在农具组合系统中，由于单件农具的特有属性，它在系统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相对角色，以其特有功能支持了整个系统的运行，显示了系统与元件之间的相互依存局面。

农具的系统性还表现在动态的平衡过程中。一定社群所使用的农具的品种、类型始终处在不断的衍生和变化之中。农具随着现实的可能性和需要不断更新换代。每一个新农具种类的出现，不见得产生于本民族内部，但它一旦被一个民族采用，就会被整合到这个民族已有的农具系统中去，成为已有农具系统的一部分。它可能以与其他民族、其他区域的人所不同的方式被使用，甚至给它取一个本族语的称谓。当然，这种整合并不是把新农具的作用完全湮没在系统中，事实上这种新因素的增加会引起整个系统功能的因变，从而推动农耕水平的发展变化。

农具是人从事农耕活动的基本手段，是人作用于土地、作用于自然的基本媒介。在不同的农地利用模式和农耕文化中，其农耕工具系统也表现出相互的差异。农地利用的模式与农具的组合方式具有直接的相关关系。用什么样的农具组合对土地施加影响，就会有怎样的农地利用特征。农耕工具是人实现农业生态系统布局的基本手段，而农地利用模式是人利用农具进行农业生态系统布局的结果，它们的相互作用体现出不同的农耕文化特征。

（三）农耕礼仪

这里农耕礼仪，是指伴随着农耕活动的各个环节而进行的约定俗成、程式化、制度化的仪式。滇南少数民族的农耕礼仪一般表现出较浓厚的宗教仪式色彩，如开秧门、关秧门、叫谷魂、叫牛魂、祭谷仓等。由于农耕活动具有明显的以一年为一个周期的特点，各种农耕礼仪也主要表现为与一个农业生产周期中的节律相合拍的特征。

伴随农耕活动而形成的文化表现是多种多样的，如生产组织、分配和消费等，本研究把对农耕活动中的这些经济社会内涵的探讨弱化，而突出农耕礼仪，有点避重就轻之嫌。这样做的基本考量是：农耕文化的许多思想内涵往往在农耕礼仪中集中、突出地表现出来；农耕礼仪是伴随农耕活动而进行的一些习俗仪式。这些农耕礼仪并不直接产生农耕活动的效果，而只是耕作者愿望的表达，它是一些精神性的行为。这些行为集中表达了耕作者对耕作对象、耕作目的等的观点和愿望，因此，是揭示农耕思想的基本行为载体。从中，我们可以理解不同的耕者对于土地、自然、庄稼乃至农具等的思想观念。在不同的农耕形态中，不同的农耕民族中，农耕礼仪是有差别的。这体现了他们对自然、对土地、对耕作和对农耕宗旨理解上的差异和特色；体现了不同文化对于人与其环境关系的根本理念。本研究将重点放在不同农耕模式对于环境资源的认知和利用情况，因此，这种选择符合我们的目标。

三、研究框架

农耕文化首先是一种生计形式。它是以人们对土地的农业利用为基础，以农具使用为手段，以获取农产品为直接目标，并体现和表达社会对这一农耕形式的深层理解的文化系统。

格尔茨说：“我所坚持的文化概念既不是多重所指的，也不是含糊不清

的：它表示的是从历史上留下来的存在于符号中的意义模式，是以符号形式表达的前后相袭的概念系统，借此人们交流、保存和发展对生命的知识和态度。”^① 这是一个符号学角度的文化概念，强调文化是符号或意义之网。从农耕文化的角度看，农地模式是人类农耕行为的一种直观、可视的文化符号；农具是表达人作用于自然的方式和手段的一种文化符号，它还是民族和区域之间文化交往的物证、文化嫁接符号，如解放前滇南少数民族都不会冶铁，但铁制农具已经普遍使用，因此铁农具是边疆与中原经济文化交流的典型文化证据或符号；农耕礼仪更是农耕活动理想的一种象征性或符号性表达。借助于这些文化系统“部件”的分析，可以读解出滇南农耕文化的基本面貌和特征，读解滇南少数民族与其环境的基本互动结构和发展态势。

在具体的研究坐标中，滇南的各民族构成横轴。其中，以农地利用模式、农耕工具和农耕礼仪三个项目为各民族的具体分析项，并依据三个项的不同表现形式，将各民族农耕文化划分为三种基本类型：山区旱地农耕文化、山区水田农耕文化和坝区水田农耕文化。在研究农耕工具和农耕礼仪时，为了使问题细化和集中，在三种农耕文化类型中各举一个民族为例子进行说明。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五十年变迁构成本研究的纵轴。解放以来滇南传统农耕文化在政治、经济等多种因素综合影响下发生了深刻变化：1. 农地利用模式根据变迁的特点和方式可以分为两个阶段，每个阶段在不同的农耕区出现的变化有所差异。其总体特点是：（1）水田由少到多；（2）旱地由少到多再到少；（3）林地由多到少再到多；（4）园地由萌芽到大规模发展。2. 农耕工具在不同的农耕文化类型区域也有不同的变化：（1）山区旱地农耕文化区，从以刀斧、点种棒加条锄等为基本工具的刀耕火种形式转变到板锄和犁、耙耕作的普及；在山区水田稻作农耕文化区，主要是锄犁工具的进一步普及；而在坝区水田稻作文化区，目前，已经进一步发展为电机耕作的普及；（2）在粮食运输、加工等方面机械化出现并得到广泛的普及。3. 农耕礼仪，从解放初期的盛行、庄严，到文化大革命时期的萎缩、消失，再到改革

^① [美] 克利福特·格尔茨 (Clifford Geertz) 著，韩莉译：《文化的解释》，109 页，南京，译林出版社，1999。

开放以后的复兴和娱乐性质的增强，体现了社会文化的深刻变化。

这些变化的综合结果，是经济的发展、与外界联系的强化和自给自足农耕社会向外向型农耕社会的转变。这些变化的文化生态学意义是什么？

从根本上说，社区生态系统是一个人工生态系统。不仅田地、村寨等人类的直接作品是这样，森林等自然特征明显的要素，实际上也是作为水源林或防护林等而人为地被留存在这个系统里的，它们是系统总体布局的有机组成部分。“人工生态系统是指人类与其生存环境相互作用的网络结构，是人类对自然环境适应、加工、改造而建造起来的特殊生态系统。在人工生态系统中，自然系统、经济系统、社会系统组成了一个复合体，人成为系统的中心。由于自然系统、经济系统、社会系统的组合不同，人工生态系统分为农业生态系统、城市生态系统等。……农业生态系统是在一定时间和地区内，人类从事农业生产，利用农业生物与非生物环境之间以及与生物种群之间的关系，在人工调节和控制下，建立起来的各种形式和不同发展水平的农业生产体系。”^① 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各种实践，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从以粮为纲、向森林要粮到以粮代赈、退耕还林等等，都对区域文化生态产生了直接的影响。它们不仅仅是土地利用和农业结构的调整问题，实际上涉及我们如何生活，如何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等这样一些基本的生存问题。它意味着区域社会和自然资源配置方式的深刻变化，劳动力、劳动方式、产品消费方式、土地利用方式、其他自然资源的获取和处置方式、物种之间的关系等都进行了重组，从而也改变了区域文化生态系统的传统运行模式。这些变化，引起了滇南各族人民对自己长期形成的生计方式，以及人与自然关系等的传统理解的反思，甚至出现了思想上的冲击。对此，我们最后对滇南各族人民在变迁中的文化适应问题做了探讨。

① 任文伟，郑师章：《人类生态学》，201页，北京，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2004。

第二章 农地利用模式

在人类的农耕历史中,无论是生产工具、生产活动、需求结构还是财产权属或组织社会的方式,都是围绕农业土地利用这一中心的,因此农业土地利用是整个农耕社会的基础,或者说,农地利用是整个农耕经济文化的基础。农地利用的模式受人口、生产力水平、需求偏好和环境条件等因素的共同影响,在它们的相互作用下形成的一定农地利用模式是与同样受它们的相互作用而产生的一定农耕文化类型相适应的。

第一节 概述

一、相关概念

(一) 土地的概念

土地是指地球表面的陆地部分,它包括气候、土壤、水文、地形、地质、植被等自然要素,也包括人类活动对陆地表面的各种影响和结果。人类居住在地球表面的陆地上,土地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人们的物质生活资料直接或间接地都来自土地。在人类的历史长河中,人们从土地索取衣食住行所需,维系着人类的温饱和生存。像“劳动是财富之父,土地是财富之母”及“为政之要,首在足食”等都是对土地重要性的生动概括。土地的气候、土壤、水文、地形、地质、植被等条件对人类利用土地产生深远的影响,人只有依照土地的自然条件和规律才能有效使用土地、用好土地,如人目前没有能力在寒带种植橡胶。土地作为一种资源,是人的生存和发展不可缺少的要素,因此人必须利用土地。但人类到目前有能力利用的土地是很有限的。